

· 欧洲文明研究 ·

## “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与发展

李隆国

**摘要：**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民族大迁徙”有其自身的演变史。本文以德国史学史为主，梳理该术语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民族大迁徙”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术语，用来解释罗马帝国晚期北方族群逐渐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定居，并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的历史进程。此后，逐渐形成了“自东向西迁徙”和“自北向南迁徙”两大理论解释框架。二战以后，族群迁徙理论逐渐让位于族群生成（凝聚）理论。近年来，族群认同研究取而代之，将中古早期的族群问题从人种志学领域解放出来，而以政治文化研究为主。目前，如何看待中古早期史中族群研究的必要性，学术界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关键词：**民族大迁徙 族群生成 族群认同 自东向西迁徙理论 自北向南迁徙理论

2015 年可以说是欧洲的“难民之年”。在德国，难民问题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在诸多的讨论之中，中古早期的“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备受关注。2015 年 8 月 23 日，《世界报》（Die Welt）刊发了署名记者文章：《这是新的民族大迁徙么？》（Ist das die neue Völkerwanderung?），作者布歇尔（Wolfgang Büscher）试图“打开历史书一读，发现，德国不会衰亡”。这句话显然在隐喻 1600 年前的罗马帝国。他说：“这一切何时是个尽头，是否就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直到罗马匍匐在入侵的蛮族脚下？因为这就是遥远的明镜，镜面浮现出一行字：罗马的终结。”<sup>（1）</sup>

出于这种焦虑，记者们需要征求历史学家的意见。2015 年 9 月 11 日，《世界报》的记者对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亚历山大·德芒特（Alexander Demandt）进行了专访，题为《这就是当年罗马帝国的遭遇》。这位研究古代晚期的资深历史学家非常肯定地说，这就是一场新的民族大迁徙。<sup>（2）</sup>但这只是一家之言。11 月 6 日，《柏林报》刊发了对洪堡大学

（1）Wolfgang Büscher, “Ist das die neue Völkerwanderung?”, In: *Die Welt*, 23.08.15. <http://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45532343/Ist-das-die-neue-Voelkerwanderung.html>. 下载于 2015 年 12 月。

（2）Sven Felix Kellerhoff, “Das war es dann mit der römischen Zivilisation”, In: *Die Welt*, 11.09.15, <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46277646/Das-war-es-dann-mit-der-roemischen-Zivilisation.html>. 下载于 2015 年 12 月。

中古史教授博尔果尔特的专访，题为《从来就不曾有过民族迁徙》。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学术界已经告别了‘民族大迁徙’这一术语，转而说移民。那么您怎么看‘民族大迁徙’呢？”博尔果尔特回答说：“这个术语是被人文主义者塑造出来的，1557年由维也纳的学者拉齐乌斯（Wolfgang Lazius, 1514—1565年）首次在其作品《族群大迁徙论》中使用，旨在反驳一种观点：即基于塔西佗的作品而推导出的、一个边界固定、相对静止的、统一的日耳曼人世界。”但是，“民族从来就没有迁徙过。在所谓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由各种不同族裔组成的群体在迁徙，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稳定的王国，然后型塑为某个民族。是罗马人和希腊人赋予了他们各自的名称。但是，他们绝非单一的族裔群体，而是来自非常多元的族裔。有些群体使用其他知名的族名，并试图将自己与该族名的传统连接在一起。”<sup>(1)</sup>

难民问题和移民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引发史家的新思考。借此机会，本文拟对“民族大迁徙”的学术史，进行初步的梳理。早在2002年，英语学界就出版了《论蛮族认同性》，对德国民族主义影响下的“民族大迁徙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批判。<sup>(2)</sup>作为回应，奥地利科学院的瓦尔特·波尔教授也针锋相对地梳理学术史。2013年他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认同的策略：方法论集成》。<sup>(3)</sup>同一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颜武德教授的专著《中古早期史研究的现代渊源》。这部书主要对英语和法语史学界和20世纪德语学者的研究进行了细腻的梳理，揭示了近三百年来中古早期史学与现实政治的纠葛。<sup>(4)</sup>2014年《历史研究》发表了康凯的专题论文《“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述论》，在借鉴颜武德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东哥特王国研究为个案对英语世界的研究现状也做了较深入的介绍。<sup>(5)</sup>今年，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帕特里克·格里的综述文章《作为跨文化互动的民族大迁徙》译成中文，以飨读者。<sup>(6)</sup>有鉴于此，本文围绕德语学术界的科研成果，对这一历史术语的来龙去脉略加梳理。

文章按照时间的顺序从中古早期叙述至当下。第一部分对“日耳曼人”如何与“德意志人”等同的历史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重点分析“民族大迁徙”作为一个历史术语的由来，并介绍“亚洲起源说”的民族大迁徙模式。文章接下来对1700年之后开始出现的“欧洲本位说”的相关学术史进行探讨，说明“自东向西”“自亚洲征服欧洲”的民族大迁徙

(1) “Interview mit Historiker Michael Borgolte zu Flüchtlingsströmen, Völker sind niemals gewandert”, In: *Die Berliner Zeitung*, 06.11.15, <http://www.berliner-zeitung.de/wissen/interview-mit-historiker-michael-borgolte-zu-fluechtlingsstroemen-voelker-sind-niemals-gewandert-23074920>, 下载于2015年12月。

(2) A. Gillett ed., *On Barbarian Identit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eiden: Brepols, 2002.

(3) Walter Pohl, “Introduction—Strategies of Identification: A Methodological Profile”, in Walter Pohl & Gerda Heydemann eds., *Strategies of Identificatio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Leiden: Brill, 2013, pp. 1-64.

(4) Ian Wood, *The Modern Origins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康凯：《“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述论》，《历史研究》2014年4期。

(6) 帕特里克·格里：《作为跨文化互动的民族大迁徙》，胡鸿译，2016年3月27日，<http://chuansong.me/n/2758396>，2016年4月。

模式如何被“从北向南”、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的大迁徙模式所替代。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二战后“族群生成”理论的兴起。文章最后对当下的新研究动向稍作分析，以结束全文。

## 一、日耳曼人与德意志人

所谓民族大迁徙，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而言，“375年在罗马帝国北部边境由于匈人入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从多瑙河下游出发，到罗马帝国境内获取土地。伴随日耳曼国家的建立，导致5世纪罗马帝国西部瓦解。终结于568年伦巴第人进入意大利。”而广义的民族大迁徙还包括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日耳曼人向南的迁徙活动。<sup>(1)</sup>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民族大迁徙实际上是指属于日耳曼人的诸多族群如何进入罗马帝国、获得土地，并建立王国的过程。其核心概念就是日耳曼人的统一性。因此，这里要先追溯这种统一性的获得。

古代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在这一边界线之东、之北的欧洲其他族群，在当时并没有发明文字和书写，所以，要了解他们的历史主要依靠罗马作家的记叙。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他偶尔涉及这些族群的作家还有：博瑟多尼（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公元前51年）、托勒密、老普林尼和斯特拉波等人。在作品中，作者们提供了关于日耳曼人的族群、习俗、性格等方面的经典论述，代表了罗马帝国前期，罗马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认识。这些作家之间的描述并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从而为此后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最初的资料。

公元4世纪至8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建立起自己的王国，按照时间的先后，大体有汪达尔王国、西哥特王国、勃艮第王国、盎格鲁—萨克逊诸王国、东哥特王国以及法兰克王国。这些新兴的蛮族王国都有记录其历史的作者，如东哥特王国的乔丹、法兰克王国的都尔主教格雷戈里、诺森伯里亚王国的比德等。在追溯族源的时候，他们很少使用塔西佗所用术语——日耳曼尼亚和日耳曼人，而是采用具体的族名。而且，在他们看来，各蛮族的历史就是基督教化的历史。另一方面，拜占庭史家如普罗科比等则在继续使用“日耳曼人”。

8世纪晚期，卡西诺山的本尼迪克修院的修士主祭保罗在《伦巴第史》中，第一次试图对蛮族迁徙的历史提供一种宏大的解释，并使用了日耳曼人和日耳曼尼亚这两个术语。<sup>(2)</sup>他认为，与南方相比，北方寒冷，故少疾疫，人口繁殖快。在人口压力之下，生活在日耳曼尼亚的诸部族被迫向外迁徙，“小部分前往亚洲，但大部分在欧洲内部迁徙，摧毁了高卢和伊利里库姆（Illyricum）的所有城市。但是受灾最为严重的是意大利，日耳曼尼亚诸部族中最为野蛮的族群对她进行了劫掠，如哥特人、汪达尔人、鲁吉人（Rugi）、赫鲁里人（Heroli）、图林根人（Turcilingi）等等。同样还有温尼鲁人（Winnilorum），即伦巴第人。他们源自于日耳曼人，后来快乐地统治了意大利。尽管对其迁徙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

(1) G. Wirth, “Völkerwanderung”, In: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München: B. Lexma Verlag, 1997, S. 1822-1824.

(2) Klaus Rosen, *Die Völkerwanderung*,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2002, S. 19.

法,但他们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岛。”<sup>(1)</sup>

保罗将帝国衰落与蛮族入侵联系起来。在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地区,这种观点并非鲜见。早在公元6世纪,非基督徒作家左西莫斯就将君士坦丁堡大帝与罗马帝国衰亡联系起来,认为他迁都,改变宗教信仰,引进了大量的蛮族人,是导致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sup>(2)</sup>左西莫斯也因此被兰克称誉为从蛮族与帝国关系中思考大历史的第一人。<sup>(3)</sup>大体与左西莫斯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哥特人史家乔丹,却并不认为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支裔。在其《哥特史》中,他承认哥特人来源复杂,与匈奴人关系非常密切。他说:“许多部族用多个族的人名,例如罗马人用马其顿人名,希腊人用罗马人的名字;萨尔马提亚人用日耳曼人名,而哥特人则习惯借用匈奴人的名字。”他还说:“哥特人占了日耳曼人的土地,那里现在被法兰克人所占据。”<sup>(4)</sup>暗示哥特人并不属于日耳曼人。其实,中古早期作家关于“日耳曼人”的说法,往往矛盾,一如古典作家,从而为后来的学术纷争开启了另一个源头。大体说来,意大利、希腊学者更多地继承了古代作家关于日耳曼人的术语传统,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新的族群认同正在形成中。

公元800年,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在征服萨克森人,攻灭伦巴第王国之后,复兴了西部罗马帝国。“法兰克人”成为西部欧洲最为广泛的新族群认同。806年,查理曼发布《分国诏书》,将国土分割继承,其中东法兰克尼亚,即是原来的“日耳曼尼亚”。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介绍查理曼的婚姻生活的时候,说到“他另外还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为他的妻子法斯特拉达所生,法斯特拉达是东法兰克人,亦即日耳曼人”。<sup>(5)</sup>查理曼的孙子——虔诚者路易之子日耳曼路易,因为分得东法兰克尼亚,所以得享绰号“日耳曼王”(Lodoici regis Germanorum, Hladowici Germanorum regis)。<sup>(6)</sup>成书于9世纪的《古本卜尼法斯传》则称誉传主为“日耳曼人的传教士”:“(圣)保罗是老师,则他(卜尼法斯)是学生;前者是万族之师,而他是日耳曼人的传教士。”<sup>(7)</sup>10世纪末,由兰斯的修士里歇写作的《历史》中,则往往将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相提并论,称加洛林帝国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帝国”,称奥托为“日耳曼王”。“日耳曼王奥托死后,其子奥托被日耳曼人和比利时人推举为王。”<sup>(8)</sup>

(1) G. Waitz (Hrsg.), *Pauli Historia Langobardorum*, Lib. I. 1-2. *Scriptores Rerum Langobardicarum et Italicarum*, Saec. VI-IX.,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MGH), Hannover, 1878, S. 47f.

(2) 参见左西莫斯:《罗马新史》,谢品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世界历史》2012年3期。

(3) Walter Goffart, “Zosimus, The First Historian of Rome’s Fall”,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6. No. 2 (Apr., 1971), pp. 412-441.

(4) Theodore Mommsen (Hrsg.), *Jordanis Romana et Getica*, Lib. I. IX-XI, *Auctorum Antiquissimorum tomi V Pars prior*, MGH, Berlin, 1882, S. 70-73.

(5) 艾因哈德著:《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2页。

(6) 在著名的《圣伯丁年代记》中,日耳曼路易是其主要角,出现的时候有三种可能性:路易、路易王和日耳曼路易。G. Waitz (Hrsg.), *Annales Bertiniani*,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MGH, Hannover, 1883.

(7) B. Krusch & Wilhelm Levison (Hrsg.), *Vita Altera Bonifatii auctore Traiectensi*, (14), *Vitae Sancti Bonifatii Archiepiscopi Moguntini*, MGH, Hannover & Leipzig, 1905, S. 72f.

(8) Hartmut Hoffmann (Hrsg.), *Richeri Historiarum Libri IIII*, III. 67. *Scriptores*, Tomus xxxviii, MGH, Hannover, 2000. S. 206.

因此可以说,大体在9世纪,日耳曼人组成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是新兴的加洛林法兰克帝国的一部分,大体指莱茵河以东的东法兰克尼亚地区。10世纪建立的奥托王朝虽然重新将西部罗马皇帝的称号从意大利夺回,正式开启了延续近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但该王朝也大体延续着日耳曼王国的称号。随着这个王国的扩张,日耳曼尼亚这个原本限定于莱茵河东岸地区的地理概念,不断扩张其地理内涵,逐渐包括该王国所辖的全部地区。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奥托王朝被称为“条顿王国”。根据德国学者的调查,这个术语最初出现于920年的记事条中:“巴伐利亚人自愿接受公爵阿努尔夫的统治,让他统治条顿王国(Regno Teutonicorum)。”<sup>(1)</sup>由于这部编年史现存的唯一抄本抄写于12世纪末,所以,这条纪事的历史真实性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议。<sup>(2)</sup>1990年,布玉尔教授发表《两个民族的诞生:德国人和法国人(9—11世纪)》,将条顿王国(即中古德国,拉丁语中的“条顿人”即是德语中的“德国人”)的形成系年于11世纪中期。<sup>(3)</sup>不论“条顿王国”的出现是10世纪还是11世纪,这个术语的出现标志着中古早期的日耳曼王国,逐渐转变为德意志王国,成为现代德国的直接前身。

“条顿”术语的使用,与意大利人密切相关,现存关于这一术语最多的早期文献是著名的改革派教皇格雷戈里七世的文书集,一共出现了30多次。<sup>(4)</sup>有学者指出,格雷戈里使用的“条顿”可能还含有一定的政治意图,例如他还将“条顿”与“萨克森”相提并论,意在说明自立为萨克森王的亨利四世之子亨利五世不属于条顿人的范畴,以达到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政治目的。<sup>(5)</sup>

其实,早在9世纪晚期,圣高尔修道院的修士结巴诺特克在《圣高尔传》中提到圣高尔的诗歌时,就将“条顿”和“拉丁”对举,来说明语法规则。<sup>(6)</sup>而11世纪末修订的《卡西诺山编年史》则明确提到了“条顿族”。“图勒(Tullensem)主教布鲁诺出身条顿族,乃王室后裔,罗马人请求并选举他为教皇,称之为利奥教皇。”<sup>(7)</sup>因此,可以说,在南北关系的背景之下,从11世纪中期开始,在拉丁人和条顿人的二元关系之中,文献中“日耳曼人”被“条顿人”取代。而“条顿人”(Teutonus)正是“德意志人”(Deutsch)的拉丁文写法。

12世纪中期,出身皇族的弗赖辛主教奥托写作历史名著《双城史》(或《世界编年史》),

(1) H. Bresslau (Hrsg.), *Annales ex Annalibus Iuvavensibus Antiquis excerpti*, Scriptorum Tomi xxx. Pars II. MGH, Leipzig, 1934, S. 742.

(2) Joachim Ehlers, *Die Entsteh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94, S. 94f.

(3) Carlrichard Brühl, *Die Geburt zweier Völker: Deutsche und Französer (9.-11. Jahrhundert)*, Köln: Böhlau Verlag, 2001, S. 7.

(4) Erich Caspar (Hrsg.), *Das Register Gregors VII. Teil I & 2. Epistolae Selectae Tomus II*. MGH, Berlin, 1920-1923. 其中所有格复数次数最多,为17次。

(5) Walter Mohr, “Von der ‘Francia Orientalis’ zum ‘Regnum Teutonicum’”, In: *Archivum Latinitatis Medii Aevi*, Bd. 27 (1957), S. 27-49.

(6) “很奇怪有人用‘gladius’取代‘securi’,而这既非条顿亦非拉丁用法。”Karl Strecker (Hrsg.), *Notkeri Vita S. Galli*, Poetarum Latinorum Medii Aevi Tomi IV Fasciculus II et III, MGH, Berlin, 1923, S. 1096.

(7) Hartmut Hoffmann (Hrsg.), *Chronica Monasterii Casinensis*, II. 79. Scriptores, Tomus xxxiv, MGH., Hannover, 1980, S. 324.

他提及当时人对帝国的属性存在着争议。到底是法兰克人的帝国还是条顿人的帝国，他认为后者属于前者。“在我看来，拥有罗马城的条顿王国，也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在查理曼的时候，法兰克王国统治全部高卢，即凯尔特、比利时、里昂和全部日耳曼尼亚（从莱茵河至伊利里库姆的地区）。此后王国分割继承，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被称为法兰克王国。在西法兰克尼亚，王统一直延续到（胖子）查理。而在东部，即条顿人那里，查理曼的支系首先断绝，萨克森族的亨利继位。其子奥托从篡夺帝位的伦巴第人手中将帝位夺回，归于东法兰克人即条顿人，他也就被称为条顿人的第一位皇帝……加洛林失鹿，由其他家族或者操不同语言者继立，奥托所接掌的仍是同一个王国。”<sup>(1)</sup>《双城史》将奥托创建的条顿王朝纳入到“法兰克帝国”乃至“罗马帝国”的法统之中，使得“条顿王朝”向前直接追溯到5世纪创建的法兰克王国，而远绍于公元前8世纪建城的罗马。

此后，“条顿”与“日耳曼”的互用逐渐流行开来。最为明确地表达这一看法的作者是科隆的圣玛利亚教堂的教士洛厄斯的亚历山大。在其《历史札记》中提到了高卢人、条顿人、意大利人。在他看来：“条顿人”即“日耳曼人”，“属于同一族群”，而“意大利人”即“拉丁人”。<sup>(2)</sup>但是在当时，像亚历山大这样明确地将日耳曼人等同于条顿人的作家并不太多，大多数作者的用法还不是如此明晰。例如乌尔斯贝格的布尔卡德的《编年史》在提到族群时使用“日耳曼人”，而将德意志皇帝的军队称之为“条顿人”的军队。<sup>(3)</sup>

到14世纪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将罗马与德意志帝国紧密地连成一体。要想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必须去罗马加冕，否则只能被称为德意志国王。<sup>(4)</sup>此后，随着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实力的增强，皇帝要想控制意大利越来越难。1452年，作为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此后再也没有皇帝能够到罗马加冕。1453年，查理五世颁布“黄金诏书”，正式确立七大选帝侯，从事皇帝的推选工作。皇帝的产生与罗马教皇脱离关系。1508年，皇帝马克西米连将自己的皇帝称号改为“被选举的皇帝”（Imperator electus）。随着帝国与罗马日益分离，从普世性帝国逐渐转变为一个地区性政治体，德意志地区也就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有别于罗马帝国的历史渊源。也正是作为现代德意志人的前身，赋予了日耳曼人最初的统一性。

## 二、源自于亚洲的民族大迁徙

在中古时期，世界史家很少认真去讨论古代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而是关注于宗教伦

(1) Adolf Hofmeister (Hrsg.), *O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 lib. VI, xvii,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Tomus XLV, MGH, Hannover & Leipzig, 1912, S. 277.

(2) “Noticia Seculi”, In: Herbert Grndmann und Hermann Heimpel (Hrsg.), *Die Schriften des Alexander von Roes*, Kritische Studientexte der MGH, Weimer, 1949. S. 90.

(3) Oswald Holder-Egger und Bernhard von Simson (Hrsg.), *Die Chronik des Propstes Burchard von Ursberg*,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Tomus xvi, MGH, Hannover et Leipzig, 1916. S. 34f.

(4) Bernd Schneidmüller, *Die Kaiser des Mittelalters: von Karl dem Großen bis Maximilian I*,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6, S. 14.

理教育,通过强调帝国兴亡乃历史的必然现象,从而劝谕统治者不要迷恋于人世间的权力和虚荣,要从兴亡之道中认识到上帝的意志,虔诚信主。中古晚期知名的历史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伊本多菲(Thomas Ebendorfer, 1388—1464年)在其《罗马帝国编年史》中还在坚持这一传统。在叙述西部罗马帝国的历史之后,他特地写作了一个“启示”：“上帝的审判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在罗马建城 907 年之时,奥古斯都开创的西部罗马帝国,在可怜的小奥古斯都手中丧失了其荣誉,可怜地落入了诸外族(exterarum gentium)之手,开始走下坡路……依据上帝公正的审判,度量其他人的,自己要被度量;用武力和欺骗取代其他王国的,自己也会被卑微者取代,受到其他族群的摧毁。它曾将自己立为全世界最高者,首先被阿拉里克所羞辱,此后被奥多瓦克统治了 14 年。”<sup>(1)</sup>他们的笔下并没有统一的、由日耳曼人组成的民族大迁徙,有的只是各个具体的族群的迁徙史。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却并不这么来认识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15 世纪的大学者比昂多写作了名著《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史》。在这部模仿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史》的作品中,比昂多揭示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与蛮族入侵的关联性。他认为:从君士坦丁之子君士坦提乌斯至提奥多西诸子统治的 70 年间,帝权经历了巨大的衰落。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攻陷罗马城,此后匈奴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纷纷统治高卢和意大利。在查士丁尼统治之下,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复兴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攻灭了许多蛮族王国。但是,宦官纳尔苏斯招引伦巴第人入主意大利,带来了灾难,断送了复兴。从赫拉克略时期开始,帝权的巨大衰亡开始了。由于先后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入侵,使得帝国一直衰落下去,仅仅维持了帝国之名,而无其实。<sup>(2)</sup>

比昂多全面讨论了蛮族入侵,其所论及的蛮族也极为广泛。这些蛮族来自四面八方,始于哥特人而终于土耳其人。他并没有提到“日耳曼人”,甚至都没有用当时流行的字眼“北方佬”(Septentrionales)。两代人之后的马基雅维里,就是在“北方佬”的视野之中来理解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他还是沿用了主祭保罗的理论,认为北方人口繁殖快,必须迁徙三分之一的人口,他们的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这个国家为由北方来的移民定居下来提供种种方便,这样就把罗马帝国毁灭了。”<sup>(3)</sup>一部出版于 1564 年,由匿名作者撰写而托名为马基雅维里、声称从意大利文翻译成拉丁语的作品,其标题即为《北方族群的迁徙和帝国的灭亡:清布尔人被马略征服之后》。在书中,译者提出了“五百年帝国必衰亡”的理论,而帝国衰亡则不外内因和外因,外因即“这些北方族群的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sup>(4)</sup>

15 世纪末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的重新发现,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

(1) Harald Zimmermann (Hrsg.), *Thomas Ebendorfer Chronica Regum Romanorum*, Teil 1,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ae*, Neue Series, xviii, MGH, Hannover: Hahnsche Buchhandlung, 2003, S. 239f.

(2) Blondus Falvius, *Historiarum ab Inclinacione Imperii Decades*, Venice: Primus Liber, 1483. 这里所做的摘录主要来自教皇庇护(二世?)命人制作的、非常流行的摘要本: Pii Pont. Max. *Decadum Blondi Epitome, Qua Omnis ab Inclinato Romanorum Imperio Historia*, “Ex Libro Primo”, Basileae: apud Ioannem Bebelium, 1533, S. 1-4.

(3)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页。

(4) Niccolo Machiavelli, *De Migrationibus Populorum Septentrionalium Post Devicto a Maria Cimbros et de Ruina Imperii*, Francourt: Apud Haered. Chr. Egen, 1564, S. 3-17.

事件。近年来德裔美籍学者克里布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日耳曼尼亚志》认可史的文章，2012年更出版了一部畅销书《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sup>(1)</sup>，巧妙地通过《日耳曼尼亚志》的传播史来解析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德国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但是，学者们对《日耳曼尼亚志》的接受情况，要远比重克里布斯所想象的复杂，而且《日耳曼尼亚志》本身的内容就相当庞杂模糊。例如在种族源流方面，塔西佗对哥特人的归属就非常模棱两可。他既提到哥梯尼人(Gotini)又提到了哥托内斯人(Gothones)，两族相邻，哥梯尼人更靠近罗马边境。塔西佗认为，他们不属于同一部族，其中哥托内斯人是日耳曼人，但塔西佗对该族没有提供更多的具体信息；而他了解较多的哥梯尼人，则因为说高卢语，被认为“不是日耳曼人”。<sup>(2)</sup>应该说，在近代早期，与其他古典史书相比，《日耳曼尼亚志》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对待。在使用中，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将它与其他古典史料相提并论，并没有厚此薄彼的现象。至少在哥特族源问题上，塔西佗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令人信服的信息。

哥特族源的归属问题是日耳曼人源流史上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正是哥特人开启了“蛮族”大迁徙的大潮，是他们第一个攻陷罗马(410年)，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比昂多就认为哥特人属于斯基泰人，而非日耳曼人；在他看来，后来的土耳其人即是哥特人的后裔。针对这一问题，1531年，著名学者贝阿图斯·瑞纳努斯(Beatus Rhenanus, 1485—1547年)专门写作了论文《与卜尼法斯·阿美尔巴奇论哥特种族源流书》，强调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他所依靠的史料主要是拜占庭帝国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普罗科比的《战争史》。他说：“不仅我们德意志人很少读普罗科比所著史书，而且还被一些拉丁诗行所误导，认为哥特人出自于斯基泰人。”<sup>(3)</sup>

但是，因为古典作家的论述各自不同，所以哥特人是否属于日耳曼人一直存在着争议。直到17世纪末，学者们仍然存在着分歧：“迁徙民族中的第一个就是哥特人。其名字是日耳曼语辞源，意为‘好人’。《卢恩文文献》中的记载多模糊不清，约翰·罗肯尼乌斯(Joannes Loccenius, 1598—1667年)证明它与‘Getarum’的族名是同义词。语言和习俗也非常类似。但是约翰·蓬塔努斯(Johann Isaak Pontanus, 1571—1639年)和克吕维尔(Phillip Clüver, 1580—1622年)对此予以否认。我们认为‘Gothos’，‘Gotos’，‘Gottos’和‘Getas’是同一群人……以免古老的哥特族名湮没无闻。古代几乎所有的北方民族都被称之为斯基泰人，现在则被称之为鞑靼人。至于他们的来源，争议不会更少，他们是来自斯基泰人的兵营，还是从斯堪的纳维亚来？但如果哥特人是日耳曼人，那么很清楚，他们来自于北方的日耳曼尼亚，即今天的日德兰半岛(Jutia)，属于斯堪的纳维亚。”<sup>(4)</sup>到17世纪

(1) 克里斯托夫·B. 克里布斯：《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荆腾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2) 塔西佗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7页。

(3) “Beati Rhenani Dissertatio epistolica de originibus Gothicis ad Bonifacium Amerbachium”，In: C. Peutingeri: *Sermones Convivales*, Jenae: apud Tor. Oerling. 1684, S. 88-98.

(4) Johann Christoph Bemann, *Historia Orbis Terrarum, Geographica et Civilis*, Frankfurt (Main), 1698, S. 349.

中期,比得·海林(Peter Heylin, 1599—1662年)就总结说:“关于古代民族的辞源多不可靠,大部分要靠推测,所以置而不论。”<sup>(1)</sup>

哥特人只是其中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对于日耳曼人这个词究竟来源何在,是什么意思,近代早期的学术界异说蜂起,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些人依据罗马作家的意见,认为日耳曼人意为‘兄弟’,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人情绪暴躁、身材颀长、头发金黄、躯干魁梧,习俗、宗教仪式与高卢人相近,如斯特拉波即持此说。有些人则以为这是针对罗马人而言的,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在宗教仪式或者军事习俗方面相互交流,犹如兄弟,故罗马人称其为兄弟。这是普鲁塔克的想法。有些博学之士则从日耳曼语言考察其辞源,认为‘ger’意为‘全部’,‘man’指‘人’,合起来就是‘所有人’的意思。另一些人则推测,‘ger’在高卢语中为‘战斗’,所以‘Germani’即为‘战士’之意。有些人认为这个族名源自于‘germinando’,因为该族人口繁殖极快。主祭保罗即持此说。还有些人认为这个词来自于亚洲的族群‘Carmanis’,字面意思为‘起初’。鲍伊克鲁(Kaspar Peucerus? 1525—1602年)认为‘日耳曼人’来自于‘Hermener’,即‘好斗之士’;朱尼乌斯(Hadrianus Junius? 1511—1575年)说这个词来源于‘Thogarma’,这位陀迦玛是歌箴之子,歌箴是雅弗之子,雅弗是诺亚之子。”<sup>(2)</sup>

与此类似,对于早期日耳曼人究竟包括哪些族群,近代早期的学者们也是各自有所发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近代德国诸侯并立的局面是异说蜂起的现实土壤,而是强调了提供有关日耳曼人信息的古代作家,措辞较为随意,且与时而有所不同。“塔西佗、普林尼、奥罗修、斯特拉波、托勒密都讨论过日耳曼人,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弄清日耳曼人所属各族的名字,所以我特别惊讶地发现,这些族名与特定地区相连时会出现时代错位;也会同样地感到奇怪,没有哪个作家在族名问题上与其他人意见一致,而是各自使用了不同的称呼。”在列举斯特拉波、塔西佗和奥罗修各自对日耳曼人所包含族群的名称之后,作者总结说:“族名如此悬殊,无他,唯博学的学者认为自己可以随意地给蛮族取名,就如同今天我们德意志人自由地用希腊语或者拉丁语给外国人取名一样。这是因为过去在日耳曼尼亚,根据塔西佗的观点,男女老少都不识字,即便高卢人在接受罗马的统治之前,也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字……毫无疑问,希腊人和罗马人也为他们提供族名。罗马的文字与罗马的统治一道传播开来,同时为许多族群提供了族名。”<sup>(3)</sup>

但不论他们对“日耳曼人”的辞源和所属族群存在何种分歧,他们都倾向于认为日耳曼人一直处在迁徙之中。通过不断地迁徙,这些不同的乃至互相矛盾的历史记载得以被贯穿起来,互相歧异的历史观点被调和成篇,从而提供一幅日耳曼人在旧大陆各地来回迁徙、战斗的历史画卷。虽然总体上和谐,但细节上费解。早在中古时期,日耳曼各族群各

(1) Peter Heylyn, *Cosmographie in Four Books*, 1652, p. 38. <http://quod.lib.umich.edu/e/eebo/A43514.0001.001?view=toc>. 2016年3月。

(2) Johann Jacob Hofmann, *Lexicon Universale Historicum*, Leiden: Jacob. Hackius, Cornel. Boutesteyn, Petr. Vander Aa, & Jord. Luchtman, 1698. ‘Germania’.

(3) H. Mutio, *De Germanorum prima Origine, Moribus, Institutis, Legibus & Memorabilibus*, Basileae: apud Henricum Petrum, 1539, S. 5f.

自迁徙的历史都已著录于篇。其中有关法兰克人的迁徙故事，流传最广。大约自6世纪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提供了最早的记载，经过7世纪的史学作品——《弗里德伽编年史》，发展成系统的迁徙谱系。“弗里德伽”认为，法兰克人源自于特洛伊人，在特洛伊城破之时，离开故土，转战于欧亚大陆，最终来到莱茵河畔，在墨洛温家族的领导下，创建法兰克王国，成长为西部欧洲首屈一指的政治力量。《弗里德伽编年史》的作者，还试图依托于《圣经》，将法兰克人的起源，追溯到上帝所造的第一人亚当。<sup>(1)</sup>

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地方史志编修活动蓬勃发展，从地方的角度追溯族群源流变得非常流行，也提供了大量的地方族群源流的资料；另一方面，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也需要挖掘自身的族群源流。1555年由维也纳大学教授，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官方史家沃尔夫冈·拉齐乌斯撰写，1557年出版的巨著《族群大迁徙论》，就是针对这一需要，集合地方史志研究成果，整合经学和古典作品而成的一部集大成式作品。现在学术界公认，《族群大迁徙论》正式提出了“民族大迁徙”(Migrationibus gentium)这一术语。拉齐乌斯认为“一切族群皆在迁徙之中”、族群之间彼此“交流融合”。他的这部欧洲族群史，按照族群分卷，每个重要的族群都分得一卷，凡12卷。在每卷中，先论述特定族群的源流，然后叙述他们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最后梳理所有源出于日耳曼人的、当时散布于欧洲各地的教俗贵族之谱系；从而“见证日耳曼人和基督徒之声名”。<sup>(2)</sup>

拉齐乌斯认为，日耳曼人包括汪达尔人、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他们都来自于亚洲，是在大洪水之后130年左右浮海来到了欧洲。日耳曼人源自于诺亚的孙子杜伊斯科尼(Tuiscone)，这是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日耳曼人。科隆附近的杜伊斯堡即是其定居之地。诺亚的另一位孙子亚实基拿也来到了莱茵河。他们的后裔纷纷进入到欧洲各地，成为当地的原住民。最初的日耳曼人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后来由于不断胜利，其他部族出于恐惧，很快地改变其族名，变成日耳曼人。最初的日耳曼土著被称为“杜伊斯科尼人”和“加拉泰人”，后来被称为“阿勒曼尼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高卢人”。<sup>(3)</sup>由于试图整合所有的基督教经书和古典史料，按族群编排，所以，拉齐乌斯的这本大书难免语绕重复，对各地教俗贵族的源流的梳理难免在细节上遭人诟病。<sup>(4)</sup>但他将大洪水之后诺亚后裔的迁徙视为欧洲原住民的形成史，与特洛伊之后的英雄大迁徙所开始的移民史糅合在一起，以原住民与移民的融合创新为纽带，将欧洲两大历史传统和资料融会贯通，从语言互相借用的角度印证族群之间的融合，从而重新型塑了统一的欧洲文化基础，影响极其深远。

(1) 李隆国：《〈弗里德伽编年史〉所见之墨洛温先公先王》，《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 Wolfgang Lazius, *De aliquot Gentium Migrationibus, Sedibus fixis, Reliquiis, Linguarumque, initiis et Immutationibus ac Dialectis*, Libri XII, Basileae: Ex Officia Oporiniana, 1572, S. 5-8. 这部书最初的版本并没有著录出版年代，只有一篇注明“1550年”的前言，但一般认为最早的版本为1555年或者是1557年本。

(3) Wolfgang Lazius, *De aliquot Gentium Migrationibus, Sedibus fixis, Reliquiis, Linguarumque, initiis et Immutationibus ac Dialectis*, S. 15-22.

(4) 1750年出版的《世界闻名的神圣罗马帝国自治市纽伦堡志》还援引多位学者对拉齐乌斯的批评，作为铺垫，以便进一步对拉齐乌斯关于纽伦堡历史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Johannis ab Indagine, *Beschreibung der heutiges Tages weltberühmten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 Freien Stadt Nürnberg Büchern abgefasse*, Erfurt: Im Druck und Verlag Johann Heinrich Nonnens, 1750, in fünftbuch. 3. Cap. “Was zur Zeit”.

拉齐乌斯的《族群大迁徙论》依托于经书所提出来的“日耳曼人大迁徙”理论,总体来讲,勾勒的是从东向西的迁徙历史。这种学术观点在当时数量繁多的地方史志作品中,极为流行。在1598年修纂的《迈森源流记》中,耶拿大学教授艾利亚·霍伊斯勒努指出古代地方史就是族群迁徙史,而以《圣经》为权威,“写作族群起源、他们最初和古代的定居之所、迁徙、变迁和事迹,是很困难的。不仅因为古代史家很少会提到,而且在劫掠中,文献会丧失,人们也往往放弃学习。那些得以留存下来的材料,都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和不确定性,有些资料甚至没有根据、毫无道理地夹杂着传说。我的原则是追随经学,以便得到确定的观点。如果缺乏经书,则综合可靠的作家,或者遵从较为古老的说法,以期得到真相。”<sup>(1)</sup>而他得到的真相是:迈森人与其他日耳曼人一道从东方迁徙到这些地区。至于这些人为什么经常改变定居之所,到处迁徙,霍伊斯勒努提供了三个理由。第一是寻找更好和适宜的定居点;第二是迫于人口压力,原来的土地过于狭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第三个原因则是受到邻近族群的压迫,不甘于屈服,而自愿迁徙他方。<sup>(2)</sup>

### 三、斯堪的纳维亚: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家乡

当近代早期的地方史志要续接宏大历史叙事的时候,这些深受古典学和基督教经学熏陶的学者们难免会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依附于经书和古代史诗类作品,以迁徙为纽带,构拟出时代久远的族源。但也有些地方史志作者表现出了惊人的批判意识。例如出版于1599年的《奥尔登堡伯爵事纪》的作者说:“您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叙述德意志的大贵族、伯爵和老爷们的谱系、族群和起源?一般人或者从特洛伊人,或者从罗马人,或者从其他族群溯源,这样可以起到颂扬的作用。我经常发现这样子的书写方式有些吹捧过分,是从传说作品中追溯起源。此类作品多属自欺欺人!因此您可能有些吃惊地发现,许多德国老爷们的起源竟然来自于特洛伊人和罗马人。但是,更为可靠的族源是来自‘日耳曼人’和‘条顿人’。他们也不比罗马人更晚出。这次我所写作的《奥尔登堡伯爵事纪》,不会如此好高骛远,而是利用丰富的史家、史书、古老的碑铭、可信的年代记、纹章和书信。我将奥尔登堡那值得自豪的族源不过追溯到威德金德一世(Widukind,活跃于8世纪晚期)。”<sup>(3)</sup>

进入18世纪,是工业革命的时代,也是启蒙运动的世纪。启蒙思想家以理性推理出自然之法,取代神法,并从根本上否认《圣经》作为古代历史的权威性史料。对这种依托于圣史和史诗建构的日耳曼人大迁徙进程,大哲学家伏尔泰非常不屑一顾。在世界历史教材——《风俗论》中,伏尔泰对以《圣经》为中心构建的世界历史模式冷嘲热讽,尽管他也认为文明的进程,“从东方国家开始”。他将“关于整个西方世界都是由雅弗之子歌篋繁

(1) Elia Reusner Leorinus, *De Misenorum Origine, Rebus Gestis, Mutationibus, Variis Dominatibus, Et Adentu in Germaniam*, Lipsensis: Impensis Henningi Grosii Bibliopolae, 1598, S. 185.

(2) Elia Reusner Leorinus, *De Misenorum Origine, Rebus Gestis, Mutationibus, Variis Dominatibus, Et Adentu in Germaniam*, S. 188.

(3) Hermann Hamelmann, *Das ist Beschreibung der Loeblichen Vhralten Grafen zu Oldenburg und Delmenhorst*, Oldenburg, 1599, S. 2.

殖出来”的说法当作“毫无根据的设想”。对于所谓的民族大迁徙，则指出其史料不足证：“关于蛮族，人们对他们的入侵和他们的来历都难有清楚的了解。普罗科匹厄斯、约尔南德斯给我们讲了一些神话，我们的所有作家都照抄不误。”<sup>(1)</sup>因此，他在厚厚的作品中对于蛮族入侵的描述不过寥寥数笔而已。

正是在启蒙时代，历史学家们开始依据理性原则，脱离《圣经》和亚洲，在欧洲范围内系统论述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将拉齐乌斯等人从谱系溯源的角度追述日耳曼人起源史的系统，转变为对日耳曼民族古代史的专门性研究。18世纪初由马斯科夫出版的16卷本《古代日耳曼人史》富有代表性。马斯科夫强调要对古代所有日耳曼人进行统一考察，否则他们的历史将难以理解。“古代日耳曼人领导北方民族，推翻了罗马强权，从而成为几乎所有欧洲民族的共同祖先。”古代日耳曼人史也就与罗马史一道构成了理解欧洲古代族群史的基础。马斯科夫强调，这种统一性必须载之于具体的史事，也就是古典史家关于日耳曼人的记载。在最初的希腊史家那里，日耳曼人或者被当作斯基泰人或者凯尔特人，“如果没有别的证据，我们就不能把这些希腊史家笔下的记载当作日耳曼人的史事。实际上，希腊人对日耳曼人的了解混乱而不确切，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罗马人大规模地接触到日耳曼人为止。”所以，《古代日耳曼人史》中几乎没有罗马帝国之前的日耳曼人史。

《古代日耳曼人史》叙事起点的选择，使他无视了日耳曼人自东向西来到日耳曼尼亚的迁徙过程，而集中于讨论日耳曼人如何从日耳曼尼亚向外迁徙。依据这一原则，他也对法兰克人从特洛伊出逃的故事，置之不理。从这个角度而言，马斯科夫以其切断众流的学术勇气，将古代日耳曼人史从经书的笼罩下解脱出来，成为用批判史料方法进行研究的独特历史研究对象。他的批判方法，也与我们今天所用的方法差别不大。他说：“我参考了同时代或者接近当时的作家的论述，还包括罗马钱币、铭文和其他遗留物，以及一切可以用来资证的材料。诗人的作品和颂诗我也经常引用，但只是遵循历史的原则来处理，不会过于依赖它们……如果我的叙述过于简要，那是因为古代作家的作品没有提供更多的材料。如果有不同的叙述，我都加以注明，进行比较和取舍。”

《古代日耳曼人史》不再像《族群大迁徙论》那样满篇都是王名和贵族谱系，而是通过叙述史事来讨论日耳曼人的制度，属于当时正在兴起的制度史研究。“不像编年史那样只有叙事，而是要告诉读者各个族群的制度、盟约、法律和其他背景知识。”《族群大迁徙论》用拉丁文写作，有给当时声名显赫的福格尔家族成员约翰·雅各布·福格尔的献辞；而《古代日耳曼人史》则用德语完成，没有献辞，只有前言。两位作者考虑的读者群应该有所不同。马斯科夫大概面向更为普通的读者：“现在关于德意志历史和古物的书籍都深受读者的欢迎，鼓舞我来尝试写作本民族的古史。”<sup>(2)</sup>

马斯科夫所梳理的日耳曼人迁徙史，其实就是一部日耳曼人族群在迁徙中不断战斗，

(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2、238、346页。

(2) 以上引文均见：Johann Jacob Mascou, *Geschichte der Teutschen bis zu Anfang der Fränckischen Monarchie in Zehn Büchern*, Leipzig: Verlegt Jacob Schuster, 1726. 这里主要参考的是英译本，Thomas Lediard trans.,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Germans*, London: James Mechell, 1738, “Preface”, pp. i-xii.

最终创建各主要欧洲王国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日耳曼人崇尚自由，召开全民大会，进行集体决策；不爱城市，自愿定居在农村，分地服役，成为封建地主老爷；在有些地方保留了日耳曼语言，在有些地方则只是带来了一些外来语；罗马的法律起初得到维持，但逐渐让位于日耳曼习惯法；罗马的服饰几乎彻底消失；而最为惊人的变化则是军事组织和战争艺术的日耳曼化。<sup>(1)</sup>《古代日耳曼人史》很快就被译成英文，供英语读者了解祖先的历史和制度。“我们祖先的历史，还没有用英语专门地加以论述过；我们的法律、值得歌颂的古代习俗，以及我们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他们（古代日耳曼人）的制度为模板而形成的。”<sup>(2)</sup>

据说，《古代日耳曼人史》对爱德华·吉本影响很大。<sup>(3)</sup>吉本于1776年开始动笔写作长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他自认为是“一个不带偏见的陌生人，从他们的发现，他们的争辩，甚至他们的谬误所传授的指导中，掌握一些原始的材料，可以描述处在高卢臣服于墨洛温王朝国君的武力和法律之下的罗马省民所面对的情况。”<sup>(4)</sup>但是，吉本其实还是有明显的立场。他从文明与野蛮，蒙昧与理性对立的角度，站在罗马人的立场上考察罗马帝国的衰亡、罗马人民受到的迫害以及民智的倒退。

虽然马斯科夫和吉本都自诩不带偏见地评说日耳曼人大迁徙，但实际上两人都让读者感受到了强烈的立场偏向。19世纪初，兰克才更加令人信服地站在了相对客观的立场上，来描述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他从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融合的角度，写下了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这部发表于1824年的青年之作，主题就是“展示罗马人和日耳曼族群的统一性”。统一性存在于三个方面：共同的基督教世界，统一的欧洲，同一个拉丁基督教世界。在正文开篇，他引用西哥特王阿陶尔夫的话：“在民族大迁徙开始之后不久，在其事业的起点，西哥特王阿陶尔夫想在罗马帝国的基础上，通过接受罗马法律，塑造一个新的哥特帝国。如果我们理解无误的话，那么他是想将西部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联合为一个新的整体。”通过引用，兰克引入了他的话题：民族大迁徙开启了欧洲统一性的进程。日耳曼人和罗马人通过融合最终形成了6个民族：法国人、德国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在“血缘上、宗教上、制度上、习俗上、思维上有亲缘关系”。<sup>(5)</sup>

30年后，兰克前往慕尼黑，为新登基就受到1848年革命冲击和困扰的、昔日的学生、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讲授世界历史课，他对民族大迁徙的具体历史进程进行了稍微详细的解释。他首先指出，在塔西佗那里，日耳曼世界和罗马世界是对立的；正是民族大迁徙消解了这种对立，从而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民族大迁徙分为两种

(1) Thomas Lediard trans.,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Germans*, pp. 606-607.

(2) Thomas Lediard trans.,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Germans*, “Dedication”.

(3)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三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页注4。

(4)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380页。

(5) Leopold Ranke,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35*, Leipzig: bei G. Reimer, 1824, S. iii-xix.

类型：远征定居型（西哥特人等）和移民型（法兰克人等）。但是日耳曼人与匈奴人不同，后者完全是野蛮而不懂文化的（吉本运用人种志学和中国历史资料，曾证明二者都属于同一个野蛮世界），而日耳曼人是“我们的祖先”。因此日耳曼人大迁徙的影响绝不只是野蛮化。“罗马帝国的西部虽然被摧毁，但各个行省的人与占领者取得某种联合由此而产生了新的民族。同时，西方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和日耳曼完全与东方国家分离了。自那时起，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相互交融而自成一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有了延续至今的发展变化。”日耳曼人接受了罗马行政管理的方法，同时在法律方面改善罗马法，并将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联合起来，宗教和文学为适应日耳曼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再创造，产生了第三种充满生机的元素。“教会、王权、宪法、管理、法律、文学，所有这一切从这时起都逐渐发展成为罗马—日耳曼式的了。”<sup>(1)</sup>

兰克对日耳曼人从何而来，并没有加以讨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耳曼起源问题又有了新的突破。语言学家通过比较梵文和欧洲语言，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并通过比较词汇学构拟出“原始印度日耳曼语”（即“原始印欧语言”）。他们认为存在梵文和欧洲语言共同的语言来源，即“原始印度日耳曼语”，而使用该语言的人群，则被称为“原始印度日耳曼人”（即“原始印欧人”）。这个族群原本定居在中亚地区，后来向四方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语言发生变化，逐渐演变为梵文、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哥特语、古德语等。通过比较词汇学，假定这些语言共享同一词源的单词共同组成原始印度日耳曼语的词汇表，它们就组成了“原始印度日耳曼语”的常用词。通过这些词汇可以还原“原始印度日耳曼人”的生活情况。例如他们业已定居下来，组成大家庭，采用阴历和十进制；了解了矿石，但没有使用金属工具；驯化了家畜，但不知道耕作；等等。<sup>(2)</sup>“原始印度日耳曼语”和“原始印度日耳曼人”的发现，重新与拉齐乌斯的传统，从而与中古经书言说的人类迁徙模式相互印证，使得从东到西的日耳曼人大迁徙说得到“科学的”证明。

恩格斯也是深受这一发现所鼓舞的革命家和学问家。为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史观，他从生产力的发展出发，结合日耳曼人的迁徙过程，探索日耳曼人从氏族社会演化到阶级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其具体成果体现在《马尔克》《法兰克时代》《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以及未刊遗稿《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中。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中，恩格斯认为，欧洲的所有人群或来自于非洲，或来自于亚洲。“在这许多次移民以后（皆在史前时代）发生了一次最后一个主要大部落雅利安人的迁徙。”希腊人、拉丁人、斯基泰人、凯尔特人依次迁入欧洲，最后是日耳曼人，大约在公元前400多年以前开始迁入欧洲。日耳曼人被罗马人挡住了迁徙的步伐达300年之久。但到3世纪末，日耳曼人最终“以不可遏止的声势，冲过边境上的两条河流，泛滥到南欧和北非，直至公元568年，伦巴第人占领意大利时方才结束。”迁徙的方式是“整个整个部落，至少是

(1) 利奥波德·冯·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斯特凡·约尔丹、耶尔恩·吕森编，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7页。

(2) R. H. 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8—199页。Peter Ernst,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Stuttgart: Facultas Verlags und Buchhandels A.G., 2005, S. 43-46.

这些部落中的大部分,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到达欧洲的日耳曼人被恩格斯称为“半游牧部落”,“比较语言学证明,他们从亚洲带来了农业知识”,“使用金属的知识”,迁徙到欧洲之后,就定居下来。由于耕作和畜牧上“显著的进步”,独立发展了自己的工业。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产生人口过剩,开始“民族大迁徙”。<sup>(1)</sup>

为了调查古代日耳曼人的经济发展状况,恩格斯广泛征引了考古学的成果。但他对这个刚刚兴起的日耳曼人考古学关注甚少,也未能对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进行批判。对于这门新考古学分支的兴起,其奠基人古斯塔夫·科希纳有明确的说法:“在19世纪70年代末,我是多么幸运,柏林的饱学之士、著名的日耳曼语言学家和古代史家卡尔·穆伦霍夫的学生们中,几乎没有人对我们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感兴趣……在80年代初,所有富有批判性的、视野不受限制的人们,都将欧洲作为原始印度日耳曼人的故乡,从而使我不再忽略原始印度日耳曼时期的欧洲各民族问题。”在意识到考古发现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联之后,他提出:“只有先确定了该民族的故乡的正确地望,才能展现这一地区的文化史。换言之,那里出土的文物才会很清晰地展现出一个史前期的地层顺序,然后确立相对的时间坐标和绝对的时间定位。这方面富有开创性贡献的就是奥斯卡·蒙特利乌斯(Oscar Montelius)于1885年对瑞典的青铜时代所作的年代分析。”

借鉴瑞典考古学的成果,使得科希纳认为那里就是古代日耳曼人的故乡。但作为语言学家,科希纳也充分发扬了自己的优势,将文献回溯法与考古学相结合:“通过类比,从清晰的现在,或者从有丰富文化遗留的古代,向前回溯,照亮黑沉沉的史前时期。最好是通过古代史回溯到历史文献的开始时期,然后一直到更为古老的年代。尤其是将有关特定风格类型的知识与考古发现相印证,将具有明确地理界限的民族整体在考古学中呈现出来。”<sup>(2)</sup>在他看来,史前文化是文化裂变的结果,它不仅与地理上的变迁相关,而且也往往意味着人种方面的改变,即“文化的变迁往往就意味着族群的改变”。后来的批评者将他的理论总结为一句话:“墓葬就是民族的界碑。”<sup>(3)</sup>

科希纳明确反对关于日耳曼人起源的“亚洲说”,将自东向西的日耳曼人大迁徙说完全排除在视野之外。通过纸上记载与地下文物相印证,科希纳认为斯堪的纳维亚是日耳曼人的故乡。早在新石器时代,日耳曼人就定居在那里了。最初的印度日耳曼人自多瑙河流域兴起,然后向四周迁徙。最迟于公元前3000年,原始印度日耳曼人定居于瑞典南部、丹麦等地,逐渐形成原始日耳曼人。公元前1400年,旧青铜文化形成,日耳曼人同时向外迁徙。约当公元前4世纪,日耳曼人渡过美因河,进入南德意志地区,同时也向东西方迁徙。

科希纳是非常自豪的。与希腊人和印度人用文献证明的历史(至多诞生于公元前1500年)相比,他用考古学证据证明了日耳曼人的历史比这些文明的历史还要早上1000年。

(1)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78—523页。

(2) 以上引文均见Gustaf Kossinna, *Die Herkunft der Germanen: zur Methode der Siedlungsarchäologie*, Würzburg: Curt Kabitzsch, 1911.

(3) Hans Jürgen Eggers, *Einführung in die Vorgeschichte*, Berlin: Scipvaz-Verlag, 2006, S. 213.

“不像其他民族歪曲历史真相，我们德国人和其他日耳曼兄弟民族充满自豪，我们只有惊奇于这个北方原始小族群的力量，在史前和古代征服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和德意志地区，在中古时期征服了整个欧洲，在近代早期向更远的地球角落传播。”<sup>(1)</sup>

科希纳本人对罗马帝国晚期发生的“民族大迁徙”并没有作太多的评论。但在他的影响下，德国考古学界确定了经典的日耳曼人考古地层年代学。约当公元前 2000 年，欧洲的原始印度日耳曼人和当地土著结合，在波罗的海沿岸形成“原始日耳曼人”，并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 1800—公元前 800 年）。德国首相俾斯麦的身体特征被认为是这一族群体质上的典型代表。约当公元前 800—公元前 500 年，日耳曼人进入旧铁器时代，开始向四周迁徙，尤其是向伊利里库姆地区推进。此后受到凯尔特文化的影响，进入新铁器时代，直到公元前 100 年。接下来是罗马化时代，受到罗马行省文化的强烈影响，开始“民族定居”。在此后“民族大迁徙”时代，日耳曼人冲破罗马帝国的防线，扩散到整个欧洲（公元 300—公元 800 年）。在这一考古地层学图谱中，最后也是最新的地层是“中古早期”（公元 800—公元 1000 年）。

受到科希纳的巨大影响，日耳曼人考古学的工作指导原则是自后向前追溯，在欧洲找出原始日耳曼人乃至原始印度日耳曼人，并确立现代德意志人与原始日耳曼人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性。“德意志考古学试图揭示过去的状况，证明这种发展的连续性能跨越数千年。”<sup>(2)</sup>

1904 年，路德维希·施密特综合了考古学、比较语言学、地理学等各种辅助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以历史时期的文献考证和梳理为主，发表了集大成式作品——《日耳曼民族全史：至民族大迁徙结束》，按照属于东德意志的日耳曼人、属于西德意志的日耳曼人和属于北德意志的日耳曼人三大族群安排章节，提供了有史以来最为系统的民族大迁徙史。他承认，各个日耳曼人小部落聚集在某个强有力的部落的旗帜之下，导致日耳曼族群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但日耳曼人一直具有强有力的“统一性”认同。在民族大迁徙开始之后，日耳曼人按照部落（Gau）建制组合起来，每个部落约 100 男丁，由推选出来的酋长或者小王公率领，上面的领导人是公爵或者国王。王的权力非常有限，但兼有军事领袖和祭司之职，所以经常同时有双王被选立。日耳曼人战斗力很强，所以战士总数目并不大。日耳曼人军民不分，打战乃家常便饭。进入罗马境内之后，王权得到强化，建立王国。施密特也承认，由于史料不清，各个族群来自何方，如何肇建，缺乏坚实的证据。<sup>(3)</sup>关于史前期的论述，施密特主要依赖于科希纳；他的民族大迁徙史也是在“日耳曼人统一性”之下进行的论述，这种统一性就是“德国人（德意志人）”的祖先。在谋篇布局中，施密特将有关日耳曼人的制度描述与各个族群的迁徙过程一分为二，而没有依据历史变迁加以动态地考察。

(1) Gustaf Kossinna, “Die vorgeschichtliche Ausbreitung der Germanen in Deutschland”, In: Karl Weinhold (Hrsg.),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Volkskunde*, 1896, 6er. Jahrgang, Beilin: Verlag von A. Ascher & Co., S. 1-14.  
 (2) Volkmar Kellermann, *Germanische Altertumskunde: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einer Kulturgeschichte der Vor- und Frühzeit*, Berlin: Erich Schmidt Verlag, 1966, S. 9.  
 (3) Ludwig Schmid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tämme bis zum Ausgange der Völkerwanderung I*, 1,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04, S. 1-48.

#### 四、族群生成论：现代欧洲诸民族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撼了德国和欧洲。在战后出版的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深刻地反思了民族国家史学。在书中，斯宾格勒指责了欧洲中心论，通过比较，阐述了所有文明都要经历的兴衰周期。在他看来，罗马帝国的建立便标志着衰落，古典文明进入“秋天”，民族大迁徙则开启了另一个新的文明周期。正是在加洛林时代，新文明的基本成员——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突然形成。所谓民族并非种族性的，亦非语言性的，而是来自于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共同的精神和生活体验，“这种（共同生活的）感情愈深刻，民族的生命力就愈旺盛”。种族并不迁徙，迁徙的是“人们”，而且是“强悍的”“一小撮”人，利用帝国承平日久的松懈和平民的牺牲而获得胜利。<sup>(1)</sup>斯宾格勒虽然没有集中论述民族大迁徙，但他关于民族概念的新诠和古代文明衰亡导致历史断裂的基本假定，对民族大迁徙史的研究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下面先介绍民族学领域对民族学的新理解。

从长时段来看，一战后苏联历史民族学或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十月革命的成功，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性地继承旧民族理论，推陈出新。其中对民族大迁徙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强调民族适应环境而自我变迁的能力，并发展出“族群生成”理论。俄罗斯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在调查中国北方的满族和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的时候发现，尽管通古斯民族自认为一切礼仪制度纯粹来自于祖先，但其实不然，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地自我调适。为此他提出了“民族复合”的概念，并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系统阐发。<sup>(2)</sup>

强调民族与时俱进，成为苏联民族学的理论特色。“民族学是历史科学的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用直接观察、科学记述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不同的族在人种和民族特征上，在他们的变迁发展上的文化的、生活的特点，从而解决各族的起源问题，使他们的迁移史和分布史得以复现。”<sup>(3)</sup>“因此要从民族文化的运动中去研究每一族的文化。”在1930年代，苏联开展“移风易俗”，以便创建“社会主义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发展经济，积极引导民族变迁。“十分清楚，凡是谈到和经济—文化类型相一致的文化，绝不是假定以共同族系或者共同语言为前提的。”即便是历史—民族区相一致地区的考古发现，“也常常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我们这里所处理的是起源上有血统关系和语言上相近似的群体或者是语言不同的、由于长期历史接触的结果而在自己的文化上产生了共同特点的群体。”<sup>(4)</sup>

在二战前后，苏联的历史人类学家（历史民族学家）提出了“族群生成（Ethnogenez）”的概念。“过去半个世纪苏联民族学的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似乎可以被称为世界民族的历史

(1)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上册，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29—329页。

(2)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斯·普·托尔斯托夫：《苏联民族学的任务》，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辑：《民族问题译丛：民族学专辑》，1956年，第1页。

(4) 莫·格·列文、恩·恩·切波克萨罗夫：《经济文化类型与历史民族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辑：《民族问题译丛》，1956年，第39页。

史人种志学。涉及族群生成到现在的社会文化上的和民族化的进程……民族史的问题，首先是族群生成问题，在历史人种志学的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调查这些问题意义重大。相关研究表明所有现在的民族都是从不同的族群因素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复合的构成，因此，拒绝任何种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种族纯洁性’，‘始祖’和‘特殊民族’的理论。几十年来，苏联人种志学家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协作，研究了族群生成问题。从前族群生成问题主要限于语言学的证据，也局限于语言的历史之中，包括语言的起源和传播，尤其关注民族的迁徙。后来在尼古拉斯·马尔(N. Ya. Marr, 1865—1934年)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关于民族起源的原始迁徙理论受到修正。现在翻案了：迁徙的作用被彻底否定。1950年对语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消除各种误解。而且使用人类学的证据有助于质疑传统的迁徙理论：迁徙过程就是毁灭或者驱逐土著民族。因此，族群生成研究就不是简单的方法。在单个民族起源的具体研究中，二战后综合的方法结出了许多丰硕的成果。我们今天对苏联诸民族起源的了解无疑远较二三十年前要更符合历史真实。”<sup>(1)</sup>

苏联的新历史民族学理论，在二战后迅速传播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现在所见使用“族群生成”这一术语和理论的早期德语作品几乎都是来自东德和东欧国家。二战后的十多年里，东西德国还经常在一起召开历史学学术会议，东西德的历史学家们可以有充分交流的机会。<sup>(2)</sup>研究德意志民族形成问题的著名中古史家瓦尔特·希勒森革(Walter Schlesinger)原本在东德工作，1952年申请到马堡大学工作，直接影响到在那里求学的、后来在民族大迁徙研究中成功运用“族群生成”理论的文斯库斯(Reinhard Wenskus, 1916—2002年)。“开始与瓦尔特·希勒森革进行的思想交流激励他(文斯库斯)在早期和中期中古史研究中进行非常富有原创性的开拓。”<sup>(3)</sup>

与苏联民族学新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希特勒非常强调种族的血统纯洁性，也重视文化宣传对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大意义。<sup>(4)</sup>希特勒的主张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支持。如科希纳的日耳曼史前理论，“有一大批学者追随，而批评与反对者的声音无人倾听。”<sup>(5)</sup>但也要看到，纳粹时期的学术具有是非糅杂的鲜明特征。例如著名的日耳曼学家、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托·霍夫勒(Otto Höfler, 1901—1987年)通过研究民间文化，发现了日耳曼文化史的奥秘，即青年男性日耳曼人之间的秘密组织和

(1) Yu. Bromley, “Ethnographical Studies in the USSR, 1965–1969”, in Idem ed., *Soviet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Today*, Paris: Mouton & Co. The Hague, 1974, pp. 15-30.

(2) Bruno Krüger, “Zur Ethnogenese der Germanen und zu Problemen der Germanenforschung”, In: Bernhard Gramsch (Hrsg.), *Germanen-Slawen-Deutsche: Forschungen zu ihrer Ethnogenese*,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68, S. 9-20.

(3) Hans Patze, “Geleitwort”, In: Idem (Hrsg.), *Ausgewählte Aufsätze zum Frühen und Preußischen Mittelalter*, Sigmaringen: Jan Thorbecke Verlag, 1986, S. xi.

(4) Adolf Hiltner, *Mein Kampf*, München: Zentralverlag Der NSDAP, 1943, S. 311-362.

(5) Ernst Schwarz (Hrsg.), *Zur Germanischen Staateskunde: Aufsätze zum Neuen Forschungsstand*,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2, S. vii-xxx. 埃格尔在1950年代说，“科希纳犯了错误，而长期不能得到纠正。” Hans Jürgen Eggers, *Einführung in die Vorgeschichte*, S. 199-226. 1940年由纳粹党部的史前史委员会出版的《德意志民族史前史》，属于“德意志民族：性质和现状”系列丛书的一种。该书分为三卷，由多位知名学者撰稿，开篇是科希纳的大幅照片：“德意志史前史的前辈”。 Hans Reinert (Hrsg.), *Vor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tämme: Germanische Tat und Kultur auf Deutschem Boden*, erster Bd., 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40.

尚武精神。他认为，日耳曼人就是通过这种组织和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建立国家。这个理论与纳粹的政治需要相一致。但是，霍夫勒也不再静态地看待所谓日耳曼人和文化的特征，而是认为其根本特征不变的前提下，依据时代和各地的不同环境而变化，从而为文斯库斯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又如这一时期兴起的“法兰克王国的聚落、语言和人口结构”问题，旨在探索“在法兰克人手中形成的欧洲统一性”。<sup>(1)</sup>当时主要是为德国征服法国配合的学术工作，但也为后来法德和解作了准备。

而且，拥护希特勒的人并不能消灭学术界的不同声音。关于民族问题的不同意见一直还处在争鸣之中。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通过调查德语中外来词汇的数量和意义，强调德意志民族的开放性。他们认为，从地理上看，德国处于欧洲之中，所以不得不在历史上广泛借鉴周边各种文化，如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法国的启蒙文化等等。在此基础之上，德国人进行综合创新，锻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当时，他们认为德国的反面典型就是中国，“我们要避免像中国那样完全自我满足从而陷入僵化的命运之中”。<sup>(2)</sup>

纳粹时期的历史学术史还有待进一步的总结。让我们暂时先回到一战之后，考察古代文明与中古文明之间的延续和断裂问题。阿尔方索·道普什(Alfons Dopsch, 1868—1953年)的《欧洲文明的社会经济基础》几乎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同时面市，但他采取了与斯宾格勒根本不同的立场、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道普什认为，蛮族入侵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现象，罗马社会被入侵者破坏的说法也类似于神话，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偏见所构筑起来的。因为他们偏爱希腊罗马而痛恨中古；另一方面，关于条顿民族自由的神话，则是源自于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和解放农奴的运动。

在道普什看来，入侵时代没有带来任何历史的断裂，罗马和蛮族制度共同为中古文明播下了种子。他否定了关于条顿人无政治组织，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的传统观点，指出，这种状况早在凯撒时代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蛮族人分批进入帝国境内，定居下来，被分配土地，有几百年的历史。移民逐渐熟悉罗马，使得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融合起来并非什么难事。庄园制度的要素很早就萌芽起来了，这里面既有移植的成分，也包括对罗马制度的全面吸收。在政治变化上，封建主义的兴起，渊源古老而延续有序。墨洛温时期就存在封土，并不断发展。所以，地主的政治权利来源于罗马和日耳曼两个方面的综合演变。在工业和贸易领域，中古早期与罗马的断裂也并非突然且彻底。尽管经济生活上较罗马帝国盛期更加地方化，也更加自给自足，但是货币并没有退出流通领域，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也广泛存在，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只不过是对此前长期存在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化的结果而已。<sup>(3)</sup>通过解读文书而非法典条文，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

(1) Franz Petri (Hrsg.), *Siedlung, Sprache und Bevölkerungsstruktur im Frankenreich*,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3, S. ix-xix.

(2) Heinrich Dannenbauer, *Von Werden des deutschen Volkes: Indogermanen, Germanen, Deutsche*. Tübingen: Verlag von J.C.B. Mohr, 1935, S. 29.

(3) 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condensed by Erna Patzkl, trans., by M. G. Beard and Nadine Marsha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7. 这里的总结主要参考了 Hanna Vollrath, "Alfons Dopsch", In: Hans-Ulrich Wehler (Hrsg.), *Deutsche Historik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0, Bd. 7, S. 39-54.

析,道普什找到了经济生活从古代向中古的历史延续性。从方法论意义上,道普什也被认为是改变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史学家。他将德国历史学的史料批判方法引入到经济史研究,通过对史料的考辨、比较、分析,得出结论,使得经济社会史能够顺利地为大学所接纳。<sup>(1)</sup>

道普什的作品一经发表,引起学界强烈反响。褒奖者有之,批判者更不乏其人,例如路德维希·施密特批评他在运用材料上具有片面性。<sup>(2)</sup> 历史学家赫尔曼·奥宾(Hermann Aubin, 1885—1969年)也认为道普什以偏概全,用莱茵兰地区的资料来概括全部日耳曼人的迁徙地区。他认为,各地区的日耳曼人人数和定居时间各不相同,导致日耳曼人对罗马文化的影响呈现不同的状况。在有些地区日耳曼人很早就定居了,影响大,但有些地方则很少留存什么日耳曼人的痕迹。为此他划分了三个地带。中间地带从苏格兰边境穿过盎格鲁—萨克逊不列颠、尼德兰、比利时、法国北部、莱茵河左岸、多瑙河右岸的阿尔卑斯山山脚地区、巴伐利亚地区,直抵蒂罗尔南部地区。这个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征服者与罗马人互相融合的地区。这个地带以北,是日耳曼因素占据主导的地区,这个地带以南,则是罗马因素占据主导的地区。<sup>(3)</sup>

但是,总体而言,《欧洲文明的社会经济基础》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1968年,围绕道普什的这部名著,“研究之路”丛书特地编辑了一册《从古代向中古的文化断裂与延续》,编者将道普什的理论与斯宾格勒进行比较,认为道普什的书不仅在历史证据方面远胜斯宾格勒,而且也在理论上反其道而行之,决定性地将日耳曼人入侵所带来的古代与中古之间的断裂模式转化为延续性模式。<sup>(4)</sup>

吸纳道普什的观点,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更推而广之,发展出所谓的“皮朗命题”。皮朗认为日耳曼人入侵并没有带来古代世界的终结,真正终结古代世界,使得中古世界诞生的,是阿拉伯人的入侵。即“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sup>(5)</sup> 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也深受道普什的启发,不过他将古代世界向中古世界的过渡视为封建社会的开始,并划定在“9世纪中叶”,即在日耳曼人、阿拉伯人、维金人、匈牙利入侵之后。“到入侵结束时,西欧也如在世界其他部分一样,已经塑造了历史的主要框架。”<sup>(6)</sup>

道普什的成功,在德语学界引发了另外的问题,即如果日耳曼人继承了罗马文明,古代与中古之间不再是断裂了,而以延续为主。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古代日耳曼世界与中古日耳曼世界之间出现了断裂。奥托·霍夫勒基于这一假定对道普什进行了批评。他以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象征——标枪(历代皇帝加冕时手持之物)为例,说明日耳曼政

(1) Reinhard Schneider, *Das Frankenreich*,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2001, S. 96.

(2) Ludwig Schmidt, “Bemerkungen zu Dopsch,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entwicklung Bd. I.,” In: *Germania*, Bd. 5, Nr. 3 (1921), S. 128-130.

(3) Hermann Aubin, “Zur Frage der historischen Kontinuität im Allgemeinen,” In: Paul E. Hübinger (Hrsg.), *Kulturbruch oder Kulturkontinuität im Übergang von der Antike zum Mittelalt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8), S. 164-202.

(4) Paul Egon Hübinger, “Einleitung,” In: Idem (Hrsg.), *Kulturbruch oder Kulturkontinuität im Übergang von der Antike zum Mittelalter*, S. vii-x.

(5) 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6)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8页。

治文化来自于古代日耳曼文化而非罗马文化。他认为个中关键在于方法论,即如何利用古代日耳曼时代的古物和习俗,因为那个时候日耳曼人还没有真正的文献写作活动。他坚持认为,日耳曼人是纯粹的族群,其习俗和古物代代相传,“自我意识”更是一脉相承。与科希纳一样,他是非常日耳曼文化本位主义的,强调日耳曼文化的延续性。

将日耳曼民族形成问题引向新视角的文斯库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入马堡大学学习。1961年,他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族群生成和法制:中古早期的族群形成》。在作品的开篇,文斯库斯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他说,在中古早期,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同时存在着蛮族迁徙以及建国的的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的儒家文化十分强大,最终通过隋而建立了大一统的唐帝国,诸蛮族被融合进去。他问:“为什么西部不是这样的呢?诸多蛮族不将自己融入到罗马国家和文化之中呢?”<sup>(1)</sup>也就是说,最终形成的是蛮族王国,它们一直延续演化为近代民族国家。这是为什么?

文斯库斯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日耳曼人在蛮族大迁徙的时候,已经不是原始状态的民族了,借鉴人类学的术语,他们不再属于“自然民族”。<sup>(2)</sup>日耳曼人不仅业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族群,而且在迁徙的过程中,各种族群不断相遇,历经分合。在这个时候,依靠“共同的祖先记忆”使得新的更大规模的族群得以建立。“最为重要的是关于源自于共同起源的共同归属感的认知”。他将自己的考察范围限定在这种“族群认知”上,具体而言,就是在这种“族群生成”的过程中,法律制度上的族群如何与该族的自我认同之间进行互动,为此调查中古早期的各种日耳曼法律文本中篇首的谱系与其后面的法律文本之间的关系。<sup>(3)</sup>

文斯库斯关于“族群生成”的研究在德语学界迅速引起反响。尽管文斯库斯使用了自己的术语“族群生成”(Stamm-bildung),而非从俄罗斯传过来、在东德流行、也是目前流行的专用术语“Ethnogenesis”(在他的成名作中,后一词汇只出现过一次),但在今天的德语学界,“族群生成”被誉为日耳曼问题研究的“第一关键词”。而第二关键词则是“族群”(Gens)。<sup>(4)</sup>文斯库斯的“族群生成”理论,将族群的形成看成是一种民族社会学现象。在民族大迁徙之前,日耳曼人的起源问题,模糊难明,但是,正是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建立王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族群认同,奠定了现代欧洲诸民族的直接前身。换言之,现代欧洲诸民族正是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之中形成的。文斯库斯的研究,使得“民族的生成”取代“民族的起源”,成为民族大迁徙研究的新主题。

文斯库斯的研究成果出版之后,并没有立即在非德语世界引起轰动。在英语世界,学者们更是无动于衷。用哈佛大学教授霍曼斯的话来说:“这部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将来来自不同领域的信息合理地综合了,没有以论带史的不良意图。但是读者必须警觉!将诸

(1) Reinhard Wenskus, *Stamm-bildung und Verfassung: Das Werden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Gentes*, Vöhl Verlag, 1977, S. 1-2.

(2) 这个术语借鉴自人类学家缪尔曼(W. E. Mühlmann, 1904—1988年),这位缪尔曼又是在史禄国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下进行写作的。

(3) Reinhard Wenskus, *Stamm-bildung und Verfassung: Das Werden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Gentes*, S. 1-13.

(4) M. Springer, “Ethnogenese, Gens und Regnum”, In: RLGA (*Reallexikon der germanischen Altertumskunde*), Vol. 29, S. 500-502.

日耳曼族群当作一个整体的‘德意志人’进行研究,具有特别的民族含义,几乎是德语学界的专利。因此,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国评论者,基本上就是个局外人。我可能不熟悉相关文献,也无法判断作者的结论是否有权威性,例如日耳曼学者所致力之所谓‘部落问题(Chauken-frage)’。”但他相信这是一部好的学术作品。与此同时,他也同样相信,“我们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对它提出的诸多问题做出完满的答复。”<sup>(1)</sup>

真正使得文斯库斯的研究成果在英语世界闻名的功臣是维也纳大学教授沃尔弗拉姆(Herwig Wolfram, 1934—)。如同维也纳大学的诸多中古早期史前辈一样,沃尔弗拉姆也是以整理加洛林文书开始其学术生涯的。与文斯库斯一样,他也深受霍夫勒的影响,非常关心日耳曼人的起源问题,尤其是神圣王权问题。1968年因此被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讲学。在那个时候,沃尔弗拉姆还是执着于科学地考辨、拼合史料,在此基础上对日耳曼人独特的神圣王权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侧重于哥特人)。从1967年开始,他整理出版了十分重要的史料汇编:《王侯名衔》(*Intitulatio*),收录至800年的君王和贵族的拉丁文头衔。在整理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和乔丹于6世纪创作的哥特史时,沃尔弗拉姆发现其中的哥特人王族谱系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利用好友文斯库斯的“族群生成”方法,他明白,这就是哥特王族在围绕自己的谱系建构共同的祖先记忆,即所谓“核心传统”,反映了统治集团型塑族群认同的努力。依据这些族群各自的王表(谱系),沃尔弗拉姆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族群生成”类型学。

第一类:“作为压缩王表的结果,旧王国包括古老的族名一起丧失,从大量罗马帝国时代的著名‘旧族名’中创建一个新族名。这些新族名的含义从辞源上都存在着争议,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认同性称呼。凡王国消失,其王族最终失去作用,古老的王族也随之消失,不再延续。相应的‘核心传统’也会丧失,导致族群记忆中断,为新的谱系所取代。”这一类型主要指定居于帝国边境地区的族群,以法兰克人最为典型。第二种类型则是旧王国没有或者没有完全消失,如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和伦巴第王国。第三种类型处在第一和第二类型之间,表达了没有前途的衰亡。第四类与第一类略有不同,专指斯拉夫人、波罗的海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些族群,因为它们并未直接受到古代—基督教话语的影响。<sup>(2)</sup>

在对哥特族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沃尔弗拉姆后来对中古早期的族群建国史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具体说来,一群蛮族精英通过军事胜利,吸引其他人群,同时依据自己的“核心传统”,进行文化宣传,使得依附者认同于他们所宣称的这种文化传统,生成庞大的种族,结为酋邦(部落联盟),即“族群生成”。所谓核心传统则是围绕列王或者部族首领的谱系,通过口头传唱的方式,歌颂他们的英雄事迹。最终通过建国之后的那些史书而凝固下来。但是,与文斯库斯不同,沃尔弗拉姆强调了罗马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力,认为这种核心传统的构建,就是蛮族将士在为罗马帝国提供雇佣兵和盟军的过程中,对罗马管理和文化的模仿。也就是说,通过罗马化得以实现种族认同,建立国家。“他们或者通过罗马政府,

(1) George C. Homans, “Review on Wenskus”, in *Speculum*, Vol. 38, Issue 1 (Jan. 1963), pp. 161-164.

(2) Herwig Wolfram, “Typen der Ethnogenesis: Ein Versuch”, In: D. Geuenich (Hrsg.), *Die Franken und Alemannen*, Berlin: De Gruyter, 1998, S. 609-633.

或者通过罗马基督教，与罗马文化联系起来。”<sup>(1)</sup>他赞同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格里的总结：“日耳曼世界可能是罗马政治和军事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最伟大也最持久的造物。”<sup>(2)</sup>

真正使得“族群生成”理论在整个中古早期史学术界知名的，则是先后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的大学者瓦尔特·郭法特(Walter Goffart, 1934—)。郭法特将“族群生成”理论视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余孽，因此决心“将蛮族史从16世纪以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祸害中解放出来，因为德意志民族主义以各种伪装延续到今天。早在1972年，我就想写作一部远离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大迁徙时代史”。<sup>(3)</sup>1988年，郭法特发表影响深远的作品——《蛮族史的叙事者》，将中古早期有代表性的蛮族史家：乔丹、都尔的主教格雷戈里、比德以及主祭保罗的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并得出结论：所有这些蛮族叙事的奠基者都并非简单的“天真汉”，而是写作技巧高明，别怀写作动机，构造历史故事的高手。<sup>(4)</sup>

郭法特将涉及日耳曼族群迁徙及其在罗马境内建立国家之前历史的文献论述全部视为迎合写作之时的现实需要的构造，因此是靠不住的。对此，德语学者不能接受，有学者为此专门草拟长篇论文，与他商榷，认为郭法特将所有这些史家视为文学创作者，讲故事的人(Narrator)，是难以让人接受的。<sup>(5)</sup>

在2000年美国卡拉马佐的国际中古史大会上，郭法特率领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对“族群生成”理论发动了“总攻”。在会上，郭法特引证口述史学和人类学家的证言，认为口传记忆的可靠性，从时间上不超过三代人。如果有关蛮族起源的传说缺乏其他可靠史料的佐证，则多是上述蛮族史家有意识地构建出来的。<sup>(6)</sup>布拉特则利用考古学证据，来考察阿拉曼尼人的“族群生成”过程，他得出的结论是：“3、4世纪至7世纪，在物质文化上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历史变化，足以表明阿拉曼尼人有过族群生成过程。”<sup>(7)</sup>有激进的学者甚至提出，族群生成模式是中古史研究中的又一个“霸王”条款。<sup>(8)</sup>

处在直接攻击火力之下的沃尔弗拉姆和他的学生瓦尔特·波尔，则从两个方面展开回应。一方面，他们对郭法特及“多伦多派”予以坚决的回击。他们指出郭法特是在“打死老

(1) Herwig Wolfram, *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Germanic Peoples*, trans. by Thomas Dunlap,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9.

(2) Patrick Geary, *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rovingia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iv.

(3) Walter Goffart, *Barbarian Tides: the Migration Age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 p. 9.

(4) Walter Goffart, *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 (A. D. 550-800): Jordanes, Gergory of Tours, Bede and Paul the Deac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32-437.

(5) Hans Hubert Anton, “Origo gentis- Volksgeschichte: zu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Walter Goffarts Werk, *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 In: Anton Scharer und Georg Scheibelreiter (Hrsg.), *Historiographie im frühen Mittelalter*, Wi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94, S. 262-307.

(6) Walter Goffart, “Does the Distant Past Impinge on the Invasion Age Germans?”, in Andrew Gillett ed., *On Barbarian Identit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 21-38.

(7) Sebastian Brather, “Ethnic Identities as Constructions of Archaeology: The Case of Alamanni”, in Andrew Gillett ed., *On Barbarian Identit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 149-177.

(8) Charles R. Bowlus, “Ethnogenesis: The Tyranny of a Concept”, in Andrew Gillett ed., *On Barbarian Identit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 241-256.

虎”“战风车”。波尔评论郭法特专门攻击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蛮族潮》时说：“奇怪的是，作者不是针对当下的争论，而是沉浸在二战后他做学生的时代，以近似于传教士的语气在呐喊。他本来可以从许多论述这一话题的新近著述中获得帮助，但却只是靠误读来汲汲于证明他们全错了……不论这些学者的具体观点如何，他们都通通被视为‘日耳曼派’的卫道士。通过将他们附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陈旧引文之后，暗示他们也持类似观点。如果郭法特针对当下的学术观点展开争论，而不是对基本上属于虚构的‘日耳曼派扩张’恼羞成怒地进行攻击，他肯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sup>(1)</sup>

## 五、欢呼“不确定性”

除了回击“多伦多学派”，波尔也在加紧进行理论建设。一方面，重新反思文斯库斯的不足之处，清理学术遗产。“从四个方面不赞同文斯库斯：不认为种族起源只属于日耳曼人；不认可他的‘核心传统’中的精英观；文斯库斯过于喜欢‘观念史’，甚至以为种族观念带来了变迁的动力；罗马与日耳曼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及其强烈的日耳曼种族偏好的阐释倾向。”<sup>(2)</sup>

另一方面，重新型塑“维也纳学派”。波尔宣布，是沃尔弗拉姆开创了中古早期史研究的“维也纳学派”。“起源问题是维也纳的早期中古史研究特别关注的领域，而以欧洲民族的肇建与提供这些信息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为重点。中古早期历史人种志学的‘维也纳学派’由长期担任奥地利历史研究所主任的赫尔维希·沃尔弗拉姆所创建的……起源问题一方面涉及中古时期形成的共同渊源；另一方面则是针对现代民族神话语境下的应用与滥用。”<sup>(3)</sup>

但我们知道，“维也纳学派”是个很早就流行的派别术语。20世纪初的道普什就被称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而前文提到的霍夫勒也被称为日耳曼研究的“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波尔重新开山立派，其实是应对英语世界对德意志民族主义那不绝于耳的质疑之声。

与文斯库斯、沃尔弗拉姆这一辈学者相比，波尔不仅更强调族群生成中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而且更加偏向于用现代文学批评和人类学的“认同性”来阐释中古早期的族群生成，强调了听众的重要性，将目光稍微调整，从谱系的“生产者”转向了“消费者”。“如果有诸神、英雄和谱系存在，更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故事对某些人来说有意义。神话和历史有激励作用，也能影响行为……总的来说，它们是一种‘社会能量’。不必假设有‘核心传统’来传播这些故事，传奇故事本身和传播都在起作用……‘核心传统’预示着定型和不变。与之相反，事关族群行为的或多或少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和联系而已。就像沃尔弗拉姆所说的那样，阿玛尔王朝的故事跟哥特人一样散乱，追溯的可靠谱系不超过提奥德里克父亲那一辈。但是我觉得，关于哥特人的各种起源故事（各种不同来源的）广为人知，使得人

(1) Walter Pohl, “Review on Walter Goffar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2, Issue 3 (2006), pp. 912-913.

(2) Walter Pohl, “Ethnicity, Theory, and Tradition: A Response”, in Andrew Gillett ed., *On Barbarian Identit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 221-239.

(3) Walter Pohl, “Vorwort der Herausgeber”, In: Idem (Hrsg.), *Die Suche Nach Ursprüngen*,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4, S. 7.

们相信他们属于一个特定的族群。这些故事就是要使他们都相信，这就是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王，因为他们共享着一个过去。”反过来，“谱系的漏洞则更加证明了公众有此需要。”这些故事和文献的产生确实反映了客观的社会存在和需求。

在波尔的笔下，统一的日耳曼人“消失”了。“需要注意的是，日耳曼人的统一性意识，共同的起源、政治的联合，不再证明，或者只是很粗浅地证明了存在某种共同的文化。但这个名称不再指代一个统一的族群，而是人种志描述中的集合词术语。”他认为，当“历史学家寻找概念和模型去解释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应该被置于其相应的背景中来理解：日耳曼世界是在罗马世界内部被创造出来的。从时间上看，随着日耳曼尼亚不再是罗马世界的边缘，对这个进程的探索就应该停止下来。”<sup>(1)</sup>随着日耳曼人统一性的消失，一个由日耳曼人与罗马人构成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也随之消失了，剩下的则是一个统一的新世界。

在2004年出版的《日耳曼人》一书中，波尔就将研究对象限定为今天的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族群。“迄今为止的、直接找到一个关于日耳曼人的、普遍适用的认同性术语的所有尝试都宣告失败了，本书的研究对象的选择来自于古代文献中的‘日耳曼人’术语。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第人建立的罗马-日耳曼王国，在5世纪之后是在罗马故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再是德意志史的一部分……本书讨论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古代日耳曼尼亚地区。‘哥特人’向‘斯基提亚’邻居学习了骑战，3世纪后罗马人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碰见他们的时候，在当时的史料中并不被称为日耳曼人，而是与萨尔马提亚人、阿兰人和匈奴人联系在一起。因此，本书不仅不包括哥特人和格皮德人(Gepiden)，也不会将汪达尔人和其他一些小族群纳入进来，因为他们都处在匈人的统治之下。”<sup>(2)</sup>所以，属于德国史范围的日耳曼人大迁徙只包括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拉曼尼人。

在德语世界，除了波尔宣扬的“维也纳学派”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立场和流别。大体说来，考古学家们比较倾向于赞成广义的日耳曼人定义，也比较坚持存在日耳曼人的统一性。<sup>(3)</sup>文斯库斯的学生们，则比较重视日耳曼人的历史延续性，以及他们给欧洲历史带来的独特贡献。<sup>(4)</sup>热衷于文献考订的学者则比较倾向于取消日耳曼人这一概念，因为自4世纪以后这个术语从拉丁文献中基本上消失过一段时间。<sup>(5)</sup>

这种多元化的趋势甚至使得史家应用“族群生成”理论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2006年，在圣马力诺，由“社会压力跨学科研究中心”组织的关于东哥特人的研讨会中，伦敦大学教授彼得·席泽尔发表长篇文章，对10年前出版的一部博士论文进行了回顾和批判。这部作品是由帕特里克·阿莫利所撰写的，书名为《东哥特意大利的人民与认同性》。在书中阿莫利将“种族生成理论大大地复杂化”了。通过整理当时文献中的“族”名，他将族

(1) 以上引文均来自 Walter Pohl, "Ethnicity, Theory, and Tradition: A Response", in Andrew Gillett ed., *On Barbarian Identit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 221-239.

(2) Walter Pohl, *Die Germanen*,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2000, S. 2-7.

(3) Miriam SÉNÉCHEAU, "Die Germanen sind wieder da", In: *Archäologische Informationen*, 35, 2012, S. 219-234.

(4) Reinhard Wenskus, "Ü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s allgemeinen interdisziplinären Germanenbegriffs", In: Heinrich Beck (Hrsg.), *Germanenprobleme aus heutiger Sicht*, Berlin: De Gruyter, 1999, S. 1-21.

(5) Jörg Jarnut, "Zum Germanen'-Begriff der Historiker", In: Heinrich Beck (Hrsg.), *Alttertumskunde-Alttertumswissenschaft-Kulturwissenschaft*, Berlin: De Gruyter, 2012, S. 391-401.

群化为一种区域性的、具体的认同策略；通过细致比对 379 位哥特人的人名档案，他得出结论，认为族群认同不过是统治者用来调动效忠意识的意识形态策略，而且只是多元化的、竞争性的认同性中的一种，具有短暂性和实用主义的特征。它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种族特征和起源，也无法取代更为流行的地方化认同和行业认同。但族群认同策略在当时的意大利比较有效，因为那里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更加官本位。<sup>(1)</sup>

彼得·席泽尔本人关于哥特人的专著——《哥特人和罗马人》出版于 1996 年，他的观点是：在对抗查士丁尼的再征服战争中，哥特人之所以勇斗罗马军队长达 20 年，确实是因为他们基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战斗经历，形成了利益纽带，并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生成了属于哥特人的族群认同感。席泽尔认为阿莫利与他在三个方面的学术经历都非常相似。他们都接受了关于认同性的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受到了文斯库斯提出的族群生成理论和沃尔弗拉姆相关研究著述的影响；都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新学术成果进行了充分的吸收，尤其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蒙德·里奇（Edmund Leach, 1910—1988 年）关于缅甸的山区部族的研究。而且他们俩对认同性的理解基本一致，在综述中对学术文献所作的评价也基本一致。但阿莫利认为“族群生成”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作用不大。席泽尔指出，阿莫利的根本性缺陷在于样本数量太少，379 名哥特人，不过沧海一粟而已。因此他的文章标题是：《难道仅仅是意识形态策略吗？——东哥特人治下意大利的哥特人认同性》<sup>(2)</sup>。

379 名哥特人作为样本，被席泽尔认为样本太少。这一发现道出了中古早期史研究中最尴尬的困境：匮乏的史料，还相当零散，使得宏大叙事与个案研究之间的遥远似乎变得难以克服。民族大迁徙瓦解了罗马世界的统一性之后，多元化发展越来越多地从史料中呈现出来。如亚尔努特所总结的那样：莱茵河上游和下游地区的罗马化程度不同；奥多瓦克称意大利王时的意大利和伦巴第王国治下的意大利拥有各自不同的罗马残留因素；不同阶层亦不相同，例如修道院和金匠受到罗马衰亡的影响不同；而且必须考虑到不仅当时的史家有着不同的动机和指导思想，今天的史家同样受到各自意识形态的左右，在他们的笔下，对罗马化程度的评估也就各自不同。<sup>(3)</sup>

当 19 世纪中古史家建立中古早期史的宏大叙事的时候，他们也依据史料批判原则，根据文献史料反映“历史真实”的能力，将它们的价值分为三六九等，建立起一个与宏大叙事相应的史料等级体系。当近年来中古史家克服 19 世纪所创建的宏大历史叙事的时候，也同时在重估史料，乃至解构史料批判原则。似乎文献史料对历史真相的反映能力变低了，但对写作者主观认识和观念的反映程度提高了；史料之间的绝对价值高下之别变淡了，原来的文献史料等级体系大为松动，似乎一切文献史料都具有同等的价值，都能反映当时人们的认知世界。从这个角度而言，史料似乎迎来了平等的民主时代。一切史料都需

(1) Patrick Amory,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489-5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2.

(2) Peter Heather, “Merely an Ideology?—Gothic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in San I. Barnisch & Federico Maiazzi eds., *The Ostrogoths: from the Migration Period to the Sixth Century,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7, pp. 31-58.

(3) Jörg Jarnut, “Aspekte des Kontinuitätsproblems in der Völkerwanderungszeit”, In: Matthias Becher (Hrsg.), *Herrschaft und Ethnogenese im Frühmittelalter: Gesammelte Aufsätze von Jörg Jarnut Festgabe zum 60. Geburtstag*, Münster: Scriptorium, 2002, S. 1-17.

要重新被细致地分析和评估过。从宏大叙事和史料等级体系中解放出来的史料，益发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状态。对同一则史料，不同的观察者甚至可以观察到截然不同的结果。难道我们真的步入了“测不准”时代？没有了传统宏大叙事支撑的中古早期史研究，难道真像英国历史学家颜武德所说的那样：我们更加接近了兰克提出的治史目标：“如实直书”？我们真的要像他提倡的那样，“礼赞不确定性”？<sup>〔1〕</sup>

其实，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是互相依存的。从学术史的长时段来看，关于日耳曼人大迁徙的研究中一直就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日耳曼人的起源何在，哪些族群属于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在进入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因为史料的寡少，这些不确定性无法被消除。但史料的缺乏也同时使得某些零散的、能为上述问题提供部分答案的史料的意义被放大。历史学家在有意无意间都被极为珍稀的零散史料牵引着思考的方向，从而形成了学术史中长时段性的命题。例如日耳曼人自东向西迁移的理论，日耳曼人源自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假说。

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民族大迁徙实质上就是帝国边境的蛮族进入到“文献”之中的历程，或者说进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之中的过程。日耳曼人或许很早就存在，但不为“文明世界”所了解，所以文明世界所撰写的人类历史中，就没有他们的位置和一席之地。或者说，他们处在史学之光照射不到的黑暗之中。逐渐地，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文明世界”与他们发生了接触。文明世界逐渐提及他们，他们也就慢慢地被历史光线所照亮，蛮族中那些被文明世界的人感兴趣的事情通过书写被记录下来。再后来，他们迁徙了，逐渐走到文明世界的中心舞台上并参与核心事务。与此相应，他们就成为了历史书写中的主角。在文献中，世界历史的进程开始围绕他们而发展起来。

在我们梳理的漫长学术史上，这个进入世界历史的进程，曾先后被总结为“基督教化”“帝权转移”“贵族谱系”“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欧洲现代诸族群的祖先”，直到近年来的“不确定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不确定状态更多地反映了欧盟成立之后，民族性（Ethnic）从史学界淡出之后留下的巨大空白。难民问题的爆发，似乎使得宗教问题重新受到中古早期史学家的青睐，依托于中古早期史料的“基督教化”命题重获市场。但是，难民问题到底是彰显了宗教冲突，还是反映了这些年欧盟内部的社会结构变迁？或许，时间会教给我们更好的理解。

（感谢马克垚先生、王晴佳、李云飞、杜勇涛、夏洞奇、包倩怡、刘寅、康凯。他们仔细阅读文章的初稿，提出了非常有益的修改建议。）

本文作者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张晓晗）

〔1〕 Ian Wood, “In Praise of Uncertainty”, In: Walter Pohl und Max Diesenberger (Hrsg.), *Integration und Herrschaft: ethnische Identitäten und soziale Organisation im Frühmittelalter*,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2, S. 303-312. 本来应该接着介绍中国学者对民族大迁徙的介绍和研究，但是限于篇幅，只能阙如了。

# Contents and Summaries

No.3

August, 2016

## **British Local Autonomy: Three Stages of the Rule of Law**

CHENG Handa ( 4 )

British local autonomy has experienced the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by th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judicial; democracy and servi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Executive; high qua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under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is process not only vividly shows the epoch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logic of British local autonomy, experienced a thousand years without decay, won the reputation of “the home of local autonomy” for Britain.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British local autonomy still maintained a certain vitality until twentieth century.

---

## **“Völkerwanderung”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rm**

LI Longguo (17)

In the late Roman Empire, groups of people entered into the Roman Empire, either by the invitation of the Roman governors or by invasion. In the following centuries these barbarous groups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ir own states. How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thi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always one major challenge at which the historians have to face. The historiographers in the Renaissance recognized these various northern groups as German people with a new term: Migratio Gentum (Völkerwanderung).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re were two widespread theories explaining the origin of these people and the routes of their immigration: Immigration from east to west and Immigration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respectively. After the World War II a new theory of Ethnogenesis first systematically put forward by Reinhard Wenskus, and then further developed along the way of ethnical Identity by the Vienna School. Nevertheless, there is still hot debate between the Anglophone scholars and the German historians about the role the ethnical groups played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

## **Ideas on Di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ipe Book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FENG Yaqiong (44)

Compared to the other sides of study on food history,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an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ideas on die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Recipe books are valuable materials to study such issues.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cipe book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ditions of society, culture and economy at that time. The contents of recipe books reflected contemporary people’s ideas on diet as well as the changes of social need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ir viewpoints were much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classical scholars; meanwhile, they put forward many creative ideas on diet. They paid lots of attentions to the med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food materials and suggested that people should choose appropriate food and cook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ir body condition. Moreover, these recipe books contained various disease treatments, which were mainly made of common food materials. In